

第 1 章

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学及社会学理论



一些基本的定义

什么是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弱点

社会学中有关后现代社会理论的

某些暗示

小 结

社会学理论（以及在一种较低的程度，更为一般地说社会学）目前正面临着许多其他领域（主要是在艺术领域）在一二十年前所遭遇的那种情景：

后现代时刻已经来临^②，困惑不已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文化人士都在搔首徘徊，他们不知道是应该去赶上这波浪头，加入这场嘉年华会，还是应该坐在一边冷眼旁观，直到这种新的时尚逐渐消失在文化流行的轮回之中。

（凯尔纳，1989年 b:1-2）

尽管一些社会学理论家以及许多社会学家们仍然把后现代社会理论视为一种时尚 对某些人（不包括本书的作者）来说它也依旧显得像是一场嘉年华会（Norris, 1990年）而不是一种严肃的学术行为。但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当前的社会学理论家们^③再也不能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有趣的杂耍了。一大批最有趣和最重要的当代社会理论卷入和环绕在后现代的舞台上。社会学理论必须关注这个正在不断增长的社会理论实体。

事实上，本书正是以社会学理论的景观正在逐渐被后现代社会理论所改变这个预设为前提的。首先，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的批评正在迫使许多社会学理论家们重新考虑他们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预设。其次，后现代主义者所创造的许多理论观念也正在逐渐地被整合到主流社会学的理论当中去。

确实有一批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们（如 Barry Smart 1993年 a，

其他一些直到目前才遭遇到后现代挑战的领域是心理分析（Sass, 1994年）和犯罪学（Schwartz and Friedrichs, 1994年）。

不过至少对某些观察家们来说它已经成为过去。按照马尔克姆·沃特斯的说法，“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的概念”（Malcolm Waters, 1995年:1）。亚历山大则认为一种逆后现代社会理论而行的趋势已经出现（Alexander, 1995年）。另见 Frow《什么是后现代主义》，1991年。

从后现代视角出发对社会学方法论（尤其是人种学）的批评，参见 Clough《人种学的终结》，1992年。

Mike Featherstone 1991 年)曾一度追赶过后现代的浪潮,某些美国的社会学理论家如 Charles Lemert 1994 年 Stjepan Mestrovic 1993 年,Steven Seidman 1994 年, Richard Harvey Brown 1987 年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然而,几乎所有重要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或者说事实上所有其著作将在本书中得到详尽考察的那些人,都不是社会学家。他们更像是一些跨学科的社会理论家,其思维的源泉来自于许多不同的学术领域。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著作是一种其要点似乎为社会学理论家们所非常熟悉的社会理论(例如米歇尔·福柯),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的著作则显得是代表了一种对社会学理论基本预设的巨大攻击(如吉恩·布希亚)。对于社会学理论家以及该领域的学生们来说,无论是何种情况,使自己熟悉那些后现代观念都是一件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事情。往小里说,那些后现代观念将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渗入到社会学的讨论中来,往大里说,他们将从根本上改变这些讨论的本质。

对后现代主义来说,社会学是一个姗姗迟来者。然而,在当前的社会学理论中,后现代主义是如此的热门(Kellner 1989 年 b:2),如此的备受争议,如此的为人们分析了又再分析,以至于至少有一个社会学理论家极力主张我们应该停止使用这个术语,因为它已经“由于过度的使用而磨损得非常脆弱了”(Lemert, 1994 年:142)。也即是说,它已经在它的支持者和毁损者双方关于其功过价值的过热的争论中被滥用和贬值了。尽管情况可能是这样,但后现代社会理论依然有许多东西值得社会学理论向其学习。

鉴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重要性以及它在人们当中所激发的兴趣,本书的目的即是试图向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生引介后现代社会理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引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暂且不说别的,在那些通常具有高度个性的社会思想家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要想给出一个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一般性概括,即使并非不可能却也非常困难。此外,要想讲述一个清楚连贯的有关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故事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后现代主义的预设之一就是:当你努力想使本来不连贯的事情变得似乎连贯起来时,歪曲常常也就发生了。正如鲍曼(Bauman, 1992 年:xxiv)所说的那样:“任何叙述……都承

担着隐含比后现代状况可能包含更多的连贯性这样一种风险。”

实际上，大多数对后现代主义所做的一般性概括都是有缺陷的，不管这种概括是来自于它的支持者还是来自于它的毁损者。它们通常与某些特定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实际所说的东西之间只有很少或完全没有相似性。因此，与那种以概括性的语言来谈论后现代主义的做法不同，贯穿本书大部分篇幅的叙述策略是对各个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后现代主义发生关联的那些特定思想家的观点进行讨论。（不过，正如本章所做的那样，出于使读者能够更好地适应后面对各个特定思想家所进行的讨论这种需要，我们也不得不非常小心地向读者提供某些有关后现代社会思想的一般性概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在本书所讨论的那些思想家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将自己标定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公开宣称自己是现代主义者，另一些人则认为将自己称之为后结构主义更好，还有一些人则不乐意或者直截了当地拒绝任何标签。但无论他们是怎样确认自己或是怎样被别人所确认，一个既成的事实是他们的思想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当前有关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文献发生着关联。正是出于这种理由，本书才将他们的思想涵盖于内。

此处的另一个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信条之一是那一一直以另类的方式加以宣称的“人”（当然也包括女人）的死亡，主体的死亡，或者作者的死亡。尽管在本书中的许多地方我们都将不断地回到对这些相互关联的观念之意义的探讨上来，但为了当前讨论的目的，我们首先可以对此类宣称作出如下这样一种理解，即它意味着一种关注焦点上的转换：与以往人们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文本的作者以及作者所说之意义上不同，后现代主义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文本本身以及一种文本与另一些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即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互文性”）^①。斯皮瓦克（Spivak, 1974 :liv）以如下方式提出这种论点：“清点前辈们的大名必须被看作是一种方便的虚构。每个大名都确立了一个与文本的匿名性相对的至高无上的自我。”尽管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用来讨论各种文本以及它们如何与其他文本发生关联的，但这些讨论却都是在每个具体作者的名

以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读者而不是作者身上

号下组织起来的。在这种意义以及许多其他的意义上，这显然不是一种后现代的做派。无论如何，我的观点是：只有通过独立地呈现每个作者的著作，我们才可能开始竭尽全力去理解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各种涵义。要想在福柯或布希亚这样一些重要思想家的著作中追寻其迂回曲折的知识踪迹是极其困难的，让我们将那种想去解开由不可胜数的其他文本所织成的、缠绕在每个作者以及他们的每个文本之上的那种蛛网的企图抛在一边吧。这并不是说我否认这类互文性分析的重要性，而只是说我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可以用来介绍后现代社会理论各种基本论述的有效方式。

某些后现代主义者会反对撰写一本用来讨论‘理论’的书，不管这些理论是不是后现代的。正如贝斯特和凯尔纳（Best and Kellner: 1991 年：x）所说的那样：“后现代批评直接地反对作为一种系统地发展起来的、以现实为基础的概念框架的‘理论’这个概念本身。”也即是说，他们反对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组系统地组织起来的观念要想成为一种理论，就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模拟或表现现实（表现主义）。大多数的后现代理论都充满了睿智，然而却经常是相当松散、不系统的，并且几乎没有一个是作为现实的模型而呈现出来的。真的，某些后现代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传统的社会学家们为系统地模拟现实所作出的那些努力损害了他们产生洞见的能力。正如大多数社会学理论都犯有企图发展出能够表现某些（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只能狭窄地和解释性地加以了解的）真实事物的理论这种罪行一样，他们也都犯有后现代主义者所指控的将‘现实’从‘理论’中分离出来的那种罪行。所谓真实，并不能够与对它的理解相分离，并且，不同理解之间的冲突也是无法裁决的。

然而，我认为，一组观念并不需要要么是系统化的要么是现实的表现才能够被确认为理论。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可以拒绝理论，但他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事实上就是在建构理论，并且经常是有关社会（或者失去社会）的理论。或许它们时常显得非常随意，但事实上它们至少部分地就是社会理论，并且与社会学理论家们的关注有着紧密的关联。

这本讨论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书使用我在《社会学理论》一书中曾经使用过的那同一个有关‘理论’的定义。即：理论是一组处理重

要的社会论题、有着广泛的应用领域、经受过或者允诺要经受时间检验的观念的集合。此外,在这里,正如在我的其他文章中一样,我关注的是社会学家们所做的那些理论工作,或者是在其他领域中做出来,但被确认为对社会学具有重要价值的那些理论工作。本书将要讨论的那些观点须符合上述有关理论的定义中所隐含的标准。它们可以不必是系统化的或是在表现某种现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它们考虑为理论。

更清楚地说,本书要讨论的是各种社会理论而不是各种狭义的社会学理论。尽管像各种社会学理论一样,前者处理的也是各种社会论题,但它们在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它们从许多不同的领域中汲取思想的源泉,并且是由众多难以按学科分类的思想家们提出来的。实际上,社会学理论一直都受到社会理论的强烈影响。例如,马克思就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是他提出的社会理论不仅曾经对,而且仍然继续对社会学理论产生着强大的影响。

本书公然违抗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信条,即对宏大叙事的怀疑。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以讲述某领域或某学科的这个故事为目的的各种宏大叙事(就像包括本书在内的各种教科书所提供的那样)都只不过是一些神话,这些神话把不能与它们所讲述的故事相容的那些维度或细节统统都加以删除。就像本书一样,任何一本教科书都隐含着某些观念对另一些观念的特权,支持某些视角和排斥另一些视角。既然我在各种可能的方式中选择了其中的一种来讲述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故事(其他的方式可以参见 Kroker, 1992 年; Hollinger, 1994 年 Bertens, 1995 年)我就支持了某些观念和思想家(尤其是我选择加以深入讨论的那些)同时也排斥了另外一些观念和思想家(即几乎或完全没有得到关注的那些)进一步说,这是一个首先从社会学家的视角来讲述的故事;从其他角度(如文学批判语言学)讲述的宏大叙事在本书中是无法找到的,即使它们讲述的故事与本书的故事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如果不说更重要的话。

尽管我承认在那些选择,以及更一般地说,在本书所提供的那种现代主义叙事方式中所包含的各种问题,这样一种叙事还是需要被建构或讲述出来,以便我们能够试着对那些公认为缺乏条理性的思想给出某种程度的条理性。除了那些将自己的一生贡献于对无

条理的思想观念进行分类整理的知识分子们之外，对一个无条理的领域做一种无条理的概览是无人感兴趣的。然而，指出下面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即：我并不认为我在本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就是惟一可以讲述的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故事。可以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本书讲述的故事不过是许多可能的此类叙事中的一种而已。因此，将本书所讲述的故事视为许多可能的叙事中的一种而不是一个宏大叙事应该是更为妥当和更为准确的。

对于要设计一本教科书来将他们的基本观点向读者做一种系统化的介绍这种想法，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可能也会感到吃惊。他们将视一本教科书为一种现代的结构，后者会将自己强加于他们的观点之上，试图为它们确立一个理性的秩序，从而严重地歪曲它们。他们将视一本教科书为一所“牢笼”(Jameson, 1972 年)这所牢笼会限制和约束那些观念的自由嬉戏。无疑，本书的论述将会造成对后现代思想的歪曲，但是正如我对后现代关怀所具有的那种敏感一样，在某种公认的、由一个力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现代方式来思考和写作的作者^①所完成的现代主义工程应该具有的那些限制的范围之内，我将尽力来将这些歪曲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许多现代主义者也一样）都确定无疑地认为，与其阅读一本像本书一样的教科书，读者该做的其实应是去浏览那些原创的后现代文本，对那个互文性的领域作出自己的理解。他们的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这是读者的惟一选择的话，那么绝大多数读者对于后现代主义都将是不甚了了甚至全无所知。后现代社会理论是一个高度复杂、充满了晦涩难懂的专门术语以及矛盾的实体，除了那些最有恒心的社会思想家们之外，它会让所有其他人都退避三舍。本书是为那些真正想对围绕后现代主义而产生的各种喧哗有所了解，但是又缺乏必要的

并非只有我才有这方面的问题；包括道格拉斯·凯尔纳 (Douglas Kellner) 和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在内的其他人也有此类问题 (见第 8 章)。读者可以考虑一本由一个现代主义者来撰写的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书到底意味着什么；出现在这样一本书中的何种变形才是适当的？思考一下一本有关后现代理论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也会是很有价值的。一种可能性是：它有可能会像是 MTV 之类的东西——一个片段紧接着另一个片段，但各个片段之间几乎或完全没有联系或条理性。

训练或时间来研读那不可胜数的原始文本的人而写的。我的希望是，在阅读完本书之后，读者将得到一些基本的背景知识和进一步去探究某些原始文本的动力。如果未能如此，那么读者至少也将对有关后现代社会理论的种种激动获得一定的理解。

一些基本的定义

当尤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1995 年 :51 宣称“我不知道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时，她不仅是代表着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而且也是在代表着大多数现代主义者发言。尽管没有任何其他概念比“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在今天的学术界引起了更广泛的回响，但在这个名词及其相关术语的准确含义倒底是什么这一点上却存在着巨大的模糊性和争议。为了清楚起见，将后现代 (Postmodernity)、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和后现代社会理论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 这些词加以区分是有用的^①。

- 后现代指的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通常在一种历史的含义上被视为是紧随在现代时期之后 (Kumar, 1995 年 ; Crook, Pakulski, and Waters, 1992 年)
- 后现代主义指的是在艺术、电影、建筑等等领域中产生的各种被视为与现代文化产品不同的那些文化产品 (Kumar, 1995 年 ; Jameson, 1991 年)
- 后现代社会理论指的是一种与现代社会理论明显不同的社会理论 (Best and Kellner, 1991 年)

因此，后现代的观念包含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新的文化产品以及一种新的有关社会世界的社会理论类型。当然，所有这些后现代的要素都享有着一种共同的视野，即在最近的若干年里已经有一些新的和不同的东西 社会的、文化的或知识性的东西 出现了。这些新的后现代的发展正在日益代表着一种与现代世界不同的另类

我在这里遵循贝斯特和凯尔纳 (Best and Kellner, 1991 年 :5) 所做的区分。

选择，或者是对后者的一种取代。

这里的第一个要点是存在着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信念，即认为现代性时期正在或已经终结，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社会时期——后现代性时期的信念（Dunn, 1991 年）。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存在着许多刻画现代和后现代世界之间特征差异的不同方式，但作为一个示例，最好的一种方式是在“是否可能为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发现一些理性的解决方案”这个观点上的差异[理性是一个与现代性有着密切关联的概念（Dahrendorf, 1979 年）]。例如，林东·约翰逊（Lyndon Johnson）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动的反贫困战争就是一种与相信能够为它们的社会问题发现一种理性的解决方式这种现代社会的信念紧密相连的典型范例。可以说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此类项目已经开始失去它们以前曾经受到的偏爱，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正在进行（Elazar, 1980 年）。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政府以及它那不乐意通过发展大型项目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总体意愿至少在一种含义上正是后现代社会和不存在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单一的理性回答这种信念的代表。^① 里根政府是以其对媒体的后现代使用而不是以其在发展大型项目来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努力而著称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林东·约翰逊政府和罗纳德·里根政府之间的某个地方，^② 美国开始了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纽特·金格里奇（Newt Gingrich）更为极端的保守立场连同他与美国所订立的契约使得以下这点变的更加清楚明白，即我们已经朝着后现代世界迈进了一大步，在这个后现代世界中我们已经富有进步性地放弃了通过发现一种宏大的理性方案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紧迫社会问题的那种希望。即使作为一位民主党的总统，比尔·克林顿也被迫在他于 1996 年作的年度报告里宣称“大政府的时代已经过去”。

有必要在这里提出某种警告。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是不喜欢甚至是不愿意讨论一种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变的。

Pettegrew (1992 年) 也将注意力集中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是他视 MTV 而不是里根政府为主要的文化发展。

在使用这些例子时，我并不要有现代性就必须是自由的、后现代性就必然是保守的之类的意思。

因为首先，它构成了一种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所拒绝的那种宏大叙事。第二，它包含着一种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是与现代主义相连，因而也加以拒斥的那种线形的、年代学的思维模式。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事情极少是以一种线形的方式进步的。最后，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它包含着一种对各个历史时代之间过于单纯和简单化的区别。因此，尽管思考一种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是可能的，并且大多数此类思考都是从后现代社会理论那里得到启发，但是极少有后现代理论家接受这样一种简单的、线形的宏大叙事。他们同意说某些事情已经发生；某些事情已经被改变，但是它不是简单的和线形的（Calhoun, 1993 年）。

第二个要点是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领域相关联。在这里，它认为各种后现代产品已经倾向于取代各种现代产品（Docker, 1994 年；Strinati, 1995 年）。追随最重要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吉恩·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的说法（见第 5 章和第 6 章）在建筑学中，我们可以将纽约市的那座现代的和高度理性化的姊妹塔与后现代建筑师们的那些更加游戏化、大众化、折中化和非理性化的创作相比较。坐落在纽约市、由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设计的 AT&T 大厦由于包含着现代与后现代双重要素而经常被当作后现代建筑的一个例子为人们所乐道。另或还有由弗兰克·格赫（Frank Gehry）设计的、包含着一种传统的隔板房、外面却环绕着一层具有工业化景观的波纹金属墙的住宅（Jameson, 1991 年）。在音乐领域中，古典音乐肯定是属于现代的，与此同时，拉普音乐由于它事实上只是将现有的风格不停地加以循环而不是去创造新的风格，由于它那折中化的混合风格，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非普遍主义的地方性（主要表现的是黑人社区）特征，则被舒特曼视为后现代的（Shusterman, 1991 年）。在电视领域中，高度脱俗的节目《姊妹塔》（Twin-peaks）通常被当作后现代主义的杰出代表。与此同时，《父亲最知道》（Father Knows Best）与它那高度理性化的核心家庭一起则被视为现代电视节目的一个好例子。在电影方面，《银翼杀手》（Blade Runner），由于呈现了一个将高度未来主义和高度传统化的因素结合起来、住满了许多看上去似乎常常比人类还要更具有人性的“复制人”的未来的洛杉矶，可以被看作是一件后现代的作品，而拥有一

个圣经化的宏大叙事的《十戒》则显然要被确定为是一部现代电影。

第三个，也是与有着更加直接关联的要点，是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产生以及它与现代理论之间的区别。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社会理论倾向于成为绝对的、理性的，倾向于接受发现真理的可能性，而后现代社会理论则倾向于成为相对主义的、倾向于向各种非理性的可能性开放。然而，正如在现代社会理论当中所出现的情况那样，所有的后现代社会理论也并非都是协调一致的。斯马特 Smart, 1993 年 a) 曾经试图通过将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所采取的三个基本立场相连接的方式来为这个领域确立某种秩序。^①

第一种，或者说极端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是认为存在着一种激进的断裂，以及认为现代社会已经被一种后现代社会所取代。

第二种，或者说更为温和些的立场是认为尽管一场变迁已经发生，但后现代是产生自现代并且仍将继续与现代共存。这种立场主要是为弗雷德里克·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同样还有欧内斯特·拉克劳 Ernesto Laclau)、钱塔·莫菲 Chantal Mouffe, 1985 年) 和戴维·哈维 David Harvege, 1989 年) 一类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以及南希·弗雷泽 Nancy Fraser)、唐娜·哈拉维 Donna Haraway 和林达·尼克尔森 Linda Nicholson) 一类的后现代女权主义者 (见第 9 章) 所坚持。

最后一种，也即是斯马特本人所认同的一种立场，则是认为与其将现代和后现代视为一些不同的时代，不如将它们视为一对处于长远结合关系中的两个东西，在这种长远的对立关系中，后现代持续不断地指出现代所具有的限制。因此，它们应该被视为可供选择的两种不同视角，而不是前后相继的不同时期。这种观点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吉恩-弗朗科·利奥塔德 (Jean-Francois Lyotard) (见第 7 章)。这一视角也将型塑第 11 章中的讨论。

需要指出，尽管斯马特的上述类型学不乏用途，但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却不会对它加以理会 [他们也会拒绝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的区分 Kumar, 1995 年)] 因为它过于简

类型学的另一些例子包括罗斯诺 (Rosenau, 1972 年) 对怀疑的和肯定的后现代思想家所做的区分以及库马 (Kumar, 1995 年) 对反动的和抵抗的后现代主义所做的区分。

化了他们之间在观点上的巨大差异，并对他们当中每个人的工作都构成了严重的歪曲。实际上，尽管斯马特的分类对读者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有用的视点，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也不会对它做任何一种利用。相反，正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一旦完成导论这部分的论述，我们就将把注意力集中于各个专门思想家们的观点上，而不是那些可以把他们的观点硬塞入其中的宽泛的思想范畴上。

什么是后现代社会理论？

波林·罗斯诺 Pauline Rosenau, 1992 年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后现代社会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他主要依据后现代社会理论所反对的东西来对这种理论进行定义。首先和最明显的是，后现代主义谴责现代社会以及它在实现自己的各种承诺方面所遭遇的失败。在 20 世纪奥斯威辛、古拉格群岛的恐怖阴影之下后现代主义者质疑人们如何能够相信现代性确实给他们带来了进步以及对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的希望。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批评与现代相连的许多方面：

……（譬如）西方文明已经积累的经验、工业化、城市化、高技术、民族国家、生活在“快节奏”之中。他们对现代的各种优先权——职业、办公室、个人责任、科层制、自由民主、宽容、人道主义、平等主义、独立实验、评价标准、中立性程序、非人性的法则，以及理性化提出挑战。

（罗斯诺，1992 年：5-6）

其次，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后现代理论家们倾向于拒斥所谓的世界观、元叙事、宏大叙事和整体性等等一类的东西。他们倾向于拒斥那种认为存在着一种单一的宏观视角或答案的看法。例如正如布希亚 1990 年/1992 年：72 所指出的那样：“伟大的动力或刺激力，连同他们那些积极的、选择性的和富有诱惑性的力量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后现代主义者通常满足于与一些更为有限的解释、地方叙事或全然没有解释的状况共存。然而应该在这里

加以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言行之间经常存在着一条鸿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至少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生产了他们自己的宏大叙事。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以前都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们常常力图使自己与宏大叙事保持一种距离，因为后者往往被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第三 后现代思想家倾向于赋予各种前现代的现象如“情绪、感觉、直觉、反应、思辨、个人经验、风俗、暴力、形而上学、传统、宇宙论、巫术、神话、宗教感情以及神秘体验”等以更大的重要性 (Rosenau, 1992 年 :6)。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一特点在布希亚那里、特别是在他的“符号交换”思想中显得尤为真切。

第四，后现代思想家们拒斥现代社会在各门学科之间、文化与生活之间、虚构与理论之间、想像和现实之间所设置的那些界限 (Rosenau, 1992 年 :6)。因此，大多数后现代思想家的著作都试图打破一种或更多的这些界限，并且暗示别人可能也想这么做。比如，我们将看到布希亚就将他的社会理论描述为一种虚构、科学幻想、诗等等。

第五，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拒斥现代学术讨论中那种审慎的、理性的风格 (Nuyen, 1992 年)。后现代作者的目标更经常的是试图去震撼和触动读者，而不是试图以一种逻辑的、理性的论证来赢得他们。在风格上后现代主义者更倾向于文学化而不是学术化。

最后，与现代思想家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现代社会的核心部分不同，后现代理论家们则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社会的边缘地带：

(转向各种) 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被忽视了的事物、抵抗的领域、被遗忘之物、非理性的东西、无意义的东西、被压抑之物、模棱两可之物、经典之物、神圣之物、传统的东西、怪诞之物、极端之物、被征服之物、被遗弃之物、无足轻重之物、边缘之物、外围之物、被排斥之物、脆弱之物、湮没之物、偶然之物、被驱散之物、被取消资格之物、被延误之物、被分离瓦解之物。

(罗斯诺, 1992 年 :8)

一句话 正像罗斯诺 (Rosenau 1992 年 :8)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理论家们“提供的是不确定性而非决定论、是多样性而非一致性、是差异

性而非综合性、是复杂性而非简单性”。

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弱点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后现代社会理论基本上是在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之外发展起来的。然而，无论是社会科学（在一般层次上还是社会学在特殊层次上）面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侵袭在许多方面都显得非常脆弱。那些弱点中的许多都可以归因于在社会科学和社会学中被人们所广为接受的那种现代科学模式。^①

- 首先，许多社会学家对于他们那些具有科学倾向的同行在取得长期允诺的突破方面所遭受的失败正在变的日益不耐烦。
- 其次，有一种日益增强的警觉，使人们意识到既有的科学大多被用来满足权贵们的需要和趋于用来巩固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 第三，数目尚在不断增加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在假定的科学运作方式与它实际的作用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Knorr - Cetina, 1981 年；Latour, 1987 年）。
- 第四，大量社会问题的持续存在甚至积累清楚地表明科学无法为它提供恰当的答案。
- 第五，科学极度轻视甚至鄙视社会生活中那些形而上学和神秘方面的重要性。
- 最后，对于各种规范或者伦理问题，或对于我们应该做什么之类的问题，科学很少能够有或者完全没有贡献（Rosenau, 1992 年）。

与此相关，福克斯和瓦德（Fuchs and Ward, 1994 年^a）认为，由于其多范式（Ritzer, 1975 年）连接松散、非中心化以及为文本和学者之间的“谈话”所主导等方面的特征，社会学是一系列面对后现代的批评显得特别脆弱的领域之一。更具体地说，福克斯和瓦德认为，象社会学这样的领域在一种强烈的解构主义批评面前尤其显得

并非所有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都反对科学，例如 Latour 和 Woolgar 就不反对 Latour and Woolgar, 1979 年）。

脆弱不堪。解构是后现代主义对待知识和理论的主要方法之一 [这一观念主要是与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的著作相联系 对德里达解构主义观的讨论, 请见第 7 章] 简要地说, 解构主义者将一个文本加以拆解以凸显它的基本预设和矛盾。进一步说, 这“需要拆解环绕着一个文本的那些传统的概念、理论和理解, 包括能够对一个作者的目的和意义轻易地加以确定的那种假定” (Denzin, 1994 年 :185)。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 解构主义“企图将一堆乱七八糟的、固执地将一些被认为在当前的世界中已经不再起作用的偏见抱住不放的过往的理论残骸一扫而尽” (Denzin, 1994 年 :185)。然而, 解构主义的目标并非是要以一种修正过、改进的和更为真实的形式将这些理论重新加以整理。这样一种重构的任务不会被进行, 因为解构主义者拒斥存在着某种有待于我们去发现的终极真理这样一种观念 [事实上, 对真理的追求被视为隐藏着一种“权力意志”(有关这类观念以及尼采的其他若干观念的讨论, 请见第 2 章) 此处指的是一种通过损害其他观点来确立某种特殊视角之卓越性的愿望。①] 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答案; 存在着的只是更多的有待于“阅读”的文本和解释。换句话说, 存在着的只是更多地有待于解构主义者来加以解构的现象。

像社会学这样的文本性领域特别容易倾向于(认同)这种强烈的解构形式。尽管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可能不会同意, 但福克斯和瓦德 (Fuchs and Ward, 1994 年 a:482) 认为“存在着许多其他类型的领域, 在这些领域中, 除了文本之外, 还‘使用许多像数学符号、技术装置、实验设备之类的其他知识生产手段’。”② 福克斯和瓦德认为, 这些领域倾向于(认同)一种更为微弱的解构形式。在这里, 尽管不存在任何真理或者握有特权的认识论立场这一点已经为人们所接受, 科学仍然是在一定的基础性规则与标准的基地上进行的。相反, 像社会学这类倾向于认同强烈解构形式的领域则趋于一种“怎么样都行”的情境。社会学家撰写有关其他文本(访谈或问卷调查的结果)的文本(比如书和文章)那些其他的文本又是与人们的言和行依

在一种较为积极的意义上, 权力意志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追求超越的能力。
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也会将那些东西视为文本, 因此可以被解构。

然是文本)有关。由于一切都是文本,因而都可以加以解构和解释。不存在对一组来自那些文本的资料的任何惟一“真实”的解释。下面就是福克斯和瓦德对社会学一类领域以及为何它们特别容易倾向于解构主义和(在较为一般的层次上)更容易倾向于后现代批评的描述:

文本性领域中的从业者大量的阅读和写作,他们很快便开始相信阅读和写作就是一个人所能够做的一切。他们逐渐将整个世界都看作文本,无论后者与这种隐喻是否真正相符,对他们来讲它们都成为文本或者“语言”一类的东西。当这种世界的语言学转向完成之后,就似乎不再有任何超越文本之外的东西,因而便可以作出“指涉和表现危机”的普遍宣称。当对各种文本的评论的评论积聚成堆之时,所有那些不是文本的东西实际上就必须从视野里消失。

(福克斯和瓦德 1994 年 a:509)

尽管这是在描述社会学中的情况,但社会学并不是属于这类范畴的惟一领域。其他类似的领域还有文学、艺术等等。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就是从这些领域中发源的。

现在我们从社会科学和社会学转向更为专门化的社会学理论。赛德曼 Seidman, 1991 年将现代主义与社会学理论相联系 并且赋予它一大堆现代的特征 尤其是科学主义、基础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偏狭性等,正是这些特征使得它在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批评面前显得非常脆弱。让我们对这些特征逐一加以简略的考察。

首先,社会学理论被指控为具有科学主义的特征。即,绝大多数社会学理论家即使不相信存在着社会规律,也相信存在着普遍的观念。他们认为存在着一个尚在不断地积累着的理论知识体系,当代理论工作者们的任务就是要么为这个知识体系继续添砖加瓦,要么通过产生某种突破来把它推向一个新的台阶,以使知识的积累过程能够在一种新的水平上再次开始。然而,规律的缺乏以及在取得突破性成就方面的失败却使得社会学理论的大门朝着后现代主义者的攻击豁然洞开。

第二,社会学理论被视为是基础性的。基础主义试图将社会行

为与社会分析的基本准则置于一种坚实的哲学基础上。与此相连，赛德曼认为社会学理论“试图揭示一种社会的逻辑；它企图发现一套反映社会世界的惟一真实的语言……社会学理论企图剥去它自身的情景外衣；企图与人性的普遍状况相联结。”(Seidman, 1991 年 : 133；楷体为本书作者所加)。它使自己承担了：

界定和捍卫社会学的基本前提、概念和解释模式的责任。我们承担了解决学科纠纷和概念冲突的角色……社会学理论家已经变成社会学心智的实质上的警察。

(赛德曼, 1991 年 :132)

社会学理论家们认为他们正在为整个社会学领域提供基础。然而，没有一种这样的基础已经被揭示出来，能够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学所接受的更是肯定不存在。

第三，社会学理论倾向于采取一种总体性的世界观。对赛德曼来说，这意味着寻求“一种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为真的贯通性的总体性概念框架”(Seidman, 1991 年 :137)。这一方面与基础主义非常相似，但另一方面对赛德曼来说则意味着社会学理论家发展出了包括‘工业化、现代化、世俗化、民主化’等在内的那些关于西方‘进步’的宏大叙事，并力图将它们应用于被当作一个总体来看待的整个世界。^① 那些宏大叙事的问题是它们是单一维度的，忽视了许多其他的发展过程。对于西方社会的许多方面和许多时期，它们很少或者完全没有说什么。正如赛德曼 (1991 年 :140)所说的那样 这类理论“完全没有抓住构成任何社会生活之内容的那些多维的、异质的、道义上含糊不清的社会潮流与倾向”。更进一步说，这类理论完全忽略了世界上其余大部分地区的历史经验，并假定它们已经或者将要经历与西方社会相同的发展过程。比如，像涂尔干提出的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那种简单模型就趋于“剪除不同社会之间的各种重要差异”(Seidman, 1991 年 :139)。各种竞争的总体性理论^② (如马

对心理学中此类宏大叙事的讨论，请见 Walkerdine (1993 年)

② 把它们视为一些宏大叙事可能更好。事实上，许多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相连的术语都倾向于被不协调地加以使用，这无助于获得一种清楚的视野感。